

国际局势变迁视野下的 新中国外交 60年

秦治来

【内容提要】 透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离不开剖析中国领导人对国际局势的把握。毛泽东在两极格局的演变中不断调整中国对外政策,并最终实现中国外交回归正常轨道。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准确把握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以及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紧密联系,其“世界眼光”更加宽广,“战略思维”更加深邃,并推动中国外交达到了全方位发展的新高度。在过去的60年,中央领导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为中国外交的发展提供了一些有益的思考线索,如科学认识时代问题,力求实现内外兼修,始终坚持辩证思维等。

【关键词】 国际局势;中国外交;互动

【作者简介】 秦治来,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央编译局博士后。(北京 邮编:100091)

【中图分类号】 D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9550(2009)09-0057-08

科学判断国际形势是现代国家制定和实施对外政策的重要依据。在过去的60年间,中国领导人善于根据不断发展的国际局势,适时制定和调整中国对外政策,使中国外交更好地服务于现代化建设。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大变革孕育着大机遇和大挑战,昭示着中国外交正在迎来下一个辉煌60年。

一 改革开放前中国外交在 冷战格局变动中的不断前进

毛泽东历来注重“冷眼向洋看世界”,密切观察国际局势的变化和准确把握国际政治力量的对比,据此制定和调整中国对外政策。

(一)中国外交在两极对抗初期走向“一边倒”
中国外交在建国初期实行“一边倒”,¹是应对

美苏主导的冷战格局的一种战略选择。新中国成立时,两大阵营已经形成对峙,这是中国发展对外关系最重要的国际条件。美国和苏联对待中国革命的不同态度决定了中国外交必须立足于社会主义阵营。美国在对待新中国问题上推行错误战略,试图从东北亚、东南亚和台湾地区等中国沿海岛屿三条战线对中国进行封锁、遏制,直接促使中国领导人将“一边倒”视为打破西方国家封锁的一个锐利武器。

朝鲜战争的爆发及其战后安排极大地影响了“一边倒”外交方针的发展趋势。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是导致“一边倒”格局固定化和长期化的重

¹ 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已经明确宣布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参见毛泽东:《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载外交部编:《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93页。

要因素。¹ 朝鲜战争的结束使东北亚地区局势有所缓和,但是朝鲜半岛的长期对峙对中国在东北亚地区乃至周边地区的战略安排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美国在战略部署上仍在从东南亚和台湾地区这两条线上逼近中国,中国还要为获得进一步的安全环境做出努力。² 在这种情况下,“一边倒”外交方针便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在大力支持越南、柬埔寨等国家取得抗法战争胜利的同时,中国围绕台湾问题逐一击破美国的战略进逼。直到印度支那战争停战,中国外部环境有了明显改善以后,毛泽东才决定打开中国外交大门,“我应与一切愿与我建交的国家建立关系”。³ 令人遗憾的是,受制于当时的条件,中国广泛发展对外关系的重点最后落脚于民族主义国家。

(二)中国外交在国际格局调整中选择“两面出击”

引起中国外交格局变动的最主要外部因素是中苏关系的全面倒退。苏共二十大以后,苏联对外奉行缓和战略,使中苏在战略利益方面的冲突开始显现。从当时的国际条件看,美苏之间断断续续释放出的缓和信号将中国推到了世界政治矛盾的风口浪尖,似乎中美对抗是美苏对峙的主要原因。在越南战争不断升级的情况下,苏联积极谋求与美国缓和的做法,引起了中国领导人的强烈抵制。1969年3月发生的中苏边境冲突使本来已经恶化的中苏关系发展到了一触即发的战争边缘,加剧了毛泽东对苏联威胁中国的迫切感觉。因此,中国在继续反美的同时,逐渐走上了抗衡苏联的道路,对外工作突出意识形态的“两面开弓”。

影响中国外交格局变动的第二个外部因素是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这一时期,殖民主义体系在亚非拉地区土崩瓦解——亚洲出现了7个独立国家;非洲大陆诞生了35个新独立的国家;拉丁美洲和南太平洋地区也有6个国家获得独立。世界范围内空前高涨的民族解放运动引起了中国领导人的高度关注,坚定了中国同时与美、苏抗衡的信心。1964年7月,毛泽东指出,“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十几年的历史来看,就知道亚非拉人民将来的前途。”⁴ 为此,毛泽东果断地调整中国国际战略,将广大发展中国家视为重要战略依托,主张在世界范围建立反帝、反霸统一战线,力图打破

美苏的围堵。

配合中国外交格局变动的第三个外部因素是西方阵营发生了重大变化。毛泽东敏锐地观察到,第二次中东战争反映了“两类矛盾和三种力量”,⁵ 即西方阵营也有中国可以联合的力量。在美苏争霸取代两大阵营对抗的情况下,西欧国家出现谋求独立自主、联合自强的趋势,这有利于中国与西欧国家改善相互关系。为此,中国在国际斗争中更加注意把西欧与美国区别开来,并对西欧国家维护独立和主权的斗争给予适当支持。1963年、1964年毛泽东提出“两个中间地带”⁶ 的战略思想后,中国把对西欧的政策提高到国际反修斗争中“发展第二中间地带、争取间接同盟军”的战略高度,日益重视发展与西欧国家的关系。⁷ 中国与西欧国家关系在20世纪60年代取得重大进展,不仅有助于打破美、苏对中国的孤立和遏制,也为后来中国与西欧国家普遍实现正常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中国外交在多极化进程中实行“一条线”

进入20世纪70年代,国际局势出现明显的阶段性变化。一是世界多极化趋势日趋明显。在美苏争霸的同时,欧洲、日本等主要力量的自主外交更加明显,第三世界的力量有了明显增长。二是世界经济走向多极化。例如,美国丧失了世界经济霸主地位,西方经济形成美、欧、日三足鼎立的局面。三是美苏争霸出现了“苏攻美守”的态势。在美国深陷越战泥潭、进行战略收缩之际,苏联强化了战略攻势,大举向第三世界扩张。特别是苏联在漫长的中苏边界线上增强军事存在,支持越南的地区扩张政策,对中国的国家安全直接构成了军事威胁。

¹ 章百家:《改变自己,影响世界——20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索引》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第11页。

² 谢益显:《当代中国外交思想史》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5页。

³ 谢益显:《当代中国外交思想史》,第76页。

⁴ 毛泽东:《从历史来看亚非拉人民斗争的前途》载外交部编:《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34页。

⁵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41页。

⁶ 1963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确定了“两个中间地带”的含义: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参见毛泽东:《两个中间地带有两个》载外交部编:《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06~507页。

⁷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1957~1969),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360页。

毛泽东从容抓住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的主要矛盾,改变了同时与两个超级大国尖锐对立的局面。历史证明,毛泽东在晚年已经基本放弃了以意识形态划线的传统外交模式,有意识地立足国家安全和自身利益推动中国外交回归正常轨道。中国在构筑反对苏联霸权的国际统一战线的过程中,尤以开启中美关系的正常化最为显著。毛泽东通过启动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成功地改变了中国的外交格局,为中国后来实行对外开放廓清了道路。¹ 截至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同当时世界上独立的130多个国家中的110个国家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从根本上改变了与美国、日本和西欧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的关系。

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在中国与世界互动中的新进展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国际大环境发生了实质性变化,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更加密切、更加有力。国际环境的大变革对中国外交提出更高要求,推动了中国外交的蓬勃发展;中国外交的大发展本身又是世界大势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断改善着国际环境。

(一)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应对

邓小平以敏锐目光洞察当今世界的基本矛盾和发展趋势,提出时代主题转换的重要判断。在此基础上,邓小平调整了“一条线”外交政策,推动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日趋完善。

1 20世纪80年代的国际形势

20世纪80年代初,虽然战争危险依然存在,²但国际形势还是发生了一些微妙变化,如各国经济相互依存明显加深,中美苏战略三角关系发生积极变化等。”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明显改善:美苏关系明显趋于缓和,世界格局的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朗,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明显上升。

20世纪80年代末,国际风云突变,外部环境骤然严峻。邓小平纵览全局后明确指出:“现在旧的格局在改变中,但实际上并没有结束,新的格局还没

有形成。”³邓小平对中国在国际格局中的位置做出了正确判断,始终把中国看做世界上一支重要的力量。⁴邓小平指出,判断国际局势要做到“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⁵成为新时期中国对外工作的重要战略思维。

2 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应对国际局势的若干举措

第一,赋予独立自主外交政策新的内涵,即实行真正的不结盟。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中国改变了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执行的“一条线”战略。邓小平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⁶邓小平提出的不结盟政策,其题中之义也包括不与第三世界国家结盟。1982年8月,邓小平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专门论述了中国“不当头”⁷的思想。

第二,立足国家利益的维护,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通过总结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经验教训,邓小平明确提出,制定和实施外交政策的最高准则是维护国家利益。1989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指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⁸邓小平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反映了中国外交战略思想的根本性变化。

¹ 邓小平曾经专门对毛泽东晚年的外交功绩做出高度评价。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2页。

²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工作的重点已转移到经济建设,但对国际形势的估量却还是老看法。对此,1980年前后,时任中联部副部长的李一氓和宦乡向中央提出不同意见。虽然李一氓主持写的报告并未得到直接肯定,但是该报告关于战和问题的论述还是引起了领导的重视和思考。参见何方:《李一氓和宦乡建言外交政策》载《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7月10日,第87页。

³ 例如,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前,中苏双方已内部商定,由两国副部长级的政府特使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举行政治磋商。参见钱其琛:《外交十记》,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

⁴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3页。

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3页。

⁶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19~320页。

⁷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57页。

⁸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416页。

⁹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30页。

第三, 提倡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邓小平反复强调, 中国在国际问题上要有所作为, 积极推动建设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1988年12月, 邓小平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专门论述了建立国际新秩序¹的思想。邓小平倡导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国际新秩序。“其他方式, 如‘大家庭’方式, ‘集团政治’方式, ‘势力范围’方式, 都会带来矛盾, 激化国际局势。”²建立国际新秩序必是一个经历各种风险的、长期而曲折的过程, 必须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准则。

第四, 坚持既有对外政策不动摇。在世界格局的转换时期, 邓小平顶住了西方一些国家的重压, 依然坚持中国外交战略的国际目标。”中国能够保持对外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一个重要原因在于: 经过十多年改革开放, 中国与世界建立了日益广泛的联系。邓小平指出, “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 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 发展不起来”。³按照邓小平的战略判断, 中国的政策即使变, 也只能变得更加开放。

(二) 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应对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 世界格局进入交替时期。同前两个时期相比, 国际关系更加错综复杂。中国与世界大国的关系总体良好, 以更加开放的大国姿态融入世界, 周边安全环境处于建国以来的最好时期。在继承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的同时, 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形势的新发展, 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外交政策。

1 冷战结束后国际局势的基本特征

第一, 世界政治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进入20世纪90年代, 江泽民同志指出,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动的历史时期。两极格局已经终结, 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 世界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新格局的形成将是长期的、复杂的过程”。⁴

第二, 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 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 主要表现在: 对外贸易成为国际交往中最活跃的环节和各国经济发展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国际投资的迅速增长带来了资本的国际化; 全球贸易规则日趋统一; 等等。与此同时, 经济全球化的消极作用日益突出, 许多发展中国家进一步被边缘化; 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

政治旧秩序阻碍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 反全球化运动在全世界范围内风起云涌。

第三, 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冷战结束后, 国际竞争的焦点由军备竞赛走向以科技为先导、以经济为中心的综合国力竞争。各国积极调整经济政策和经济结构, 朝着市场化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 各国竞相调整科技战略和政策。例如, 1993年9月, 克林顿政府提出“信息高速公路计划”; 欧盟于1994年制定了第四个科研发展框架计划; 1994年10月, 日本提出了《研究信息流通新干线网计划》等等。

第四, 国际安全形势发生新变化。冷战结束后, 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呈现出多元化和复杂化的发展趋势, 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两种威胁相比, 非传统安全威胁明显上升。特别是九一一事件对国际安全局势产生了极其严重的破坏性影响, 恐怖主义成为国际社会一大公害。

2 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应对国际局势的若干举措

江泽民指出, 综观全局, 21世纪头20年, 对中国来说, 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⁵这一科学判断为新时期中国外交提出了更高要求, 也指出了前进方向。

第一, 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江泽民指出, “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 谁也不可能孤立于世界之外去发展自己的经济”。⁶在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努力下, 中国较好地适应了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新形势, 不断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 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 大大提高了参与国际经济技术竞争与合作的水平。与此同时, 中国努力推动

¹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第282页。

²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第96页。

³ 邓小平指出, “我们对外政策还是两条, 第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 维护世界和平; 第二条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第353页。

⁴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第64页。

⁵ 《江泽民文选》第一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 第241页。

⁶ 江泽民: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版, 第19页。

⁷ 《江泽民文选》第二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 第201页。

区域合作。例如,中国积极参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区域组织的经济合作,努力加强与东盟、欧盟等区域组织的合作。

第二,维护国家安全,创造长期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始终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在立足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大背景,从战略高度准确把握世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提出了新安全观。¹新安全观体现了中国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基本理念和新型国家关系准则,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一项重大理论创新。另外,中国在平衡推进核裁军、防扩散等国际安全事务方面,始终发挥建设性作用,与有关各方保持密切合作。

第三,尊重并推动世界文明的多样化。江泽民指出,“历史经验特别是近百年的历史经验一再告诫人们,强求一种模式的后果是严重的,总会引起对抗、动乱甚至战争,我们应该吸取教训”。²尤其是九一一事件后,江泽民对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指出“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³2002年10月25日,江泽民在访美期间同美国总统布什会谈时指出,“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长期共存、取长补短,在竞争比较中共同发展,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⁴江泽民的这些论述立足世界文明的发展现实和前进方向,体现了我们党对如何正确对待国际文明形势的新认识,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三)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央领导集体的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国际形势处在复杂而深刻的变化之中。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中央领导集体大力推进全方位外交,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建设性作用,越来越鲜明地展现着更加自信、务实、开放和负责的大国风范。

1 国际范围内的积极变革仍是发展潮流

第一,世界经济保持增长势头,区域经济合作不断深化。一是虽然2008年下半年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尚未见底,但是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不会发生根本性衰退。二是以“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日益成

为世界经济的强大引擎。三是区域经济合作的范围不断扩大,内涵不断深化,区域经济合作对世界贸易和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

第二,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国际形势总体稳定。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的方向发展。西方国家普遍加强了与新兴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对话和交流机制,例如,2005年7月,八国集团与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五国领导人对话会(“8+5”)这种新型南北对话模式形成机制化。而且,大国均能理性处理相互矛盾和分歧,彼此发生直接对抗的可能性越来越小,相互借重的成分明显增加,特别是在朝鲜核问题、伊朗核问题、中东安全等热点问题的解决方面,大国日益重视多边机制的重要作用。

第三,发展中国家的总体力量和国际地位不断增强。新兴发展中大国之间的互利合作对于提高南南合作的战略层次和改善南北关系意义重大。发展中国家合作的进一步加强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的发展机遇和机制支持。2006年11月,中非论坛北京峰会的成功举办说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正在迈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将继续朝着互惠、务实的方向发展。

2 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

第一,世界经济发展存在难题。一方面,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导致许多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全球化产生失望情绪,也容易引发一些发展中国家出现社会动荡;另一方面,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国际市场需求继续萎缩,全球通货紧缩趋势明显,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外部经济环境更加严峻,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

第二,局部冲突和热点问题此起彼伏。一方面,热点地区依然存在,不稳定事件屡见不鲜,例如,朝核问题引起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另一方面,大国争夺世界事务、地区事务主导权,控制世界重要地区、重要资源的斗争不断加剧。例如,“颜色革命”的背后,不难发现美国在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内推行

¹ 《江泽民文选》第二卷,第407页。

² 《江泽民文选》第一卷,第331页。

³ 《江泽民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22页。

⁴ 《江泽民文选》第三卷,第525页。

“民主战略”的痕迹。当前,从东北亚、南亚、中亚、中东到北非,构成了一条热点问题的“弧形地带”。

第三,全球性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全球环境的恶化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为了根治不断恶化的环境问题,国际社会曾经进行了诸多努力。然而,环境问题的国际合作一直深陷“小步舞”的怪圈,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切实解决全球性生态问题,共同创造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倡导绿色革命势在必行。

3 新世纪中国对外战略的三大支柱

新世纪国际形势出现的新变化、新特点对党中央的国际战略思想创新提出了更高要求,即“坚持用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提高科学判断国际形势和进行战略思维的水平”。¹中共十六大以来的中央领导集体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将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确定为新时期中国对外战略的三大支柱。

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是党中央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和战略全局高度做出的一次开创性理论创新。2005年9月15日,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60周年首脑会议举行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第一次全面阐述了和谐世界的深刻内涵及建设和谐世界的战略倡议。200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创造性地将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战略思想写进了党的政治报告。

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基于时代发展潮流和自身根本利益做出的战略抉择。²2005年12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妥善回应了国际社会对“中国以何种方式实现发展”,“对国际社会承担什么样的责任”等问题的普遍关注。

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符合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谋求互利合作、实现共同繁荣的正确理念和时代潮流。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就是要以自己的发展促进地区和世界共同发展,扩大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在实现本国发展的同时兼顾对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关切,在国际交往中实现双赢、共赢。

三 当代中国应对国际形势的若干思想启示

是否能够准确判断国际形势直接关系到中国外交战略的科学性。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人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值得汲取的教训。在过去的60年,中央领导不断提高应对国际形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为未来中国外交正确应对国际格局的大变动提供了若干思考线索。

(一)准确把握时代主题至关重要

认识时代主题属于最高层次上的国家战略判断。对时代的科学认识历来是中国共产党人制定和调整对外战略的基本依据。时代主题的转换是国际形势发生巨大而深刻变化的必然结果。

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毛泽东有独到的见解——尽量争取世界和平,但从从不奢谈和平,更不乞求和平。尽管毛泽东一度认为,大规模的侵略战争迫在眉睫,需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准备大打、早打、打核战争,但是就他的本意来说,还是充分估计到战争与和平两种可能性,并更多地寄希望于避免战争、争取和平,而把战争作为争取和平、制止战争、应付突然事件的一种必要手段。”也有学者坚持类似观点——在毛泽东的外交思想中,战争与和平是交替出现的,只不过不同时期主旋律有所不同。³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晚年对世界战争爆发的危险、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可能均出现偏高估计,对国际环境的恶化做出过度反应,导致多年来国民经济以战备为中心。这种对时代特征的误断给中国外交带来严重干扰,教训深刻。

邓小平敏锐地观察到,和平与发展已经取代战争与革命,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1985年3月4日,邓小平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论述了他

¹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7页。

²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载《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4页。

³ 李捷:《毛泽东与新中国的内政外交》,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第62~63页。

⁴ 叶自成:《新中国外交思想: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9~90页。

对“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的基本看法。¹ 同年6月4日，邓小平明确指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² 邓小平提出时代主题的转变，为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和发展提供了最为重要的理论依据。

面对冷战结束带来的外部压力，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需要认真回应“如何看待时代”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在国庆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江泽民进一步强调，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冷战结束了，但人类长期面临的和平与发展两大主要问题远未解决。”³ 面对九一一事件引起的国际局势新变化，江泽民指出，“用辩证的观点看，总体和平、缓和、稳定，局部战乱、紧张、动荡，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际局势的基本态势”。⁴

中共十六大以来的中央领导集体以深邃而宽广的历史眼光和世界眼光洞察国际形势，始终坚持对时代脉搏的准确把握。中共十七大报告再次申明，“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⁵

在当代中国的外交战略体系中，和平与发展将长期处于支配、制约其他战略目标的地位，决定中国外交的基本走向。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和平与发展的认识存在内在统一性，这些科学判断是中国认清世界大局的基本依据，是指导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外交最为重要的理论武器。

(二) 密切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把国内和国际形势联系起来综合分析、通盘考虑，历来是中国共产党制定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方法，也是中国外交不断取得进展的认识前提。

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是顺应当今世界发展潮流的必然要求，也是适应中国同外部世界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必然要求。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同世界的关系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变化。一方面，中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进程，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及全球最具潜力和竞争力的市场之一；另一方面，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建设性作用，从国际体系的被动参与者转变为积极参与者、维护者和建设者。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过渡期的结束为显著标志，中国的高速发展对世界的扩散性影响日趋明显，外部世界对中

国的影响也在与日俱增，这使得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要求变得更为迫切。有利于从国际形势变化中把握发展机遇、应对风险挑战，全面提高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中共十七大报告强调指出，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这一重大战略思想对于进一步做好中国外交的各项工作将产生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在新形势下，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要切实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第一，要坚持“量力而行”的原则，正确处理自身实力与战略意愿之间的关系。世界发展潮流浩浩荡荡，不可抗拒，但是对于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深厚文化、幅员辽阔的国家而言，它们的影响必须通过中国的内部因素才能发挥作用。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开展外交工作的最大国情是中国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⁶ 江泽民指出，“要韬光养晦，收敛锋芒，保存自己，徐图发展。我国国情与国际力量对比决定了我们必须这样做”。⁷ 当前，中国日趋具有多重属性，除了自身所特有的发展机遇和难题以外，也面临世界上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新兴大国所共有的发展机遇和难题。这样一来，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必须在吃透国情上下功夫，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和当前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第二，要掌握“顺势而为”的主动权，注重从国际国内条件的相互转化中充分利用发展机遇。改变自己是中国力量的主要来源，改变自己也是中国影响世界的主要方式。⁸ 当今时代，中国外交应善于将自身国情与世界发展趋势结合起来，做到内外兼修，既要把有利的国际条件转化为有利的国内条件，又要把有利的国内条件转化为有利的国际条件。

¹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05页。

²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26~127页。

³ 《江泽民文选》第一卷，第332页。

⁴ 《江泽民文选》第三卷，第519~520页。

⁵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载《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44页。

⁶ 邓小平在1987年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时指出，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一个全局性判断。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52页。

⁷ 《江泽民文选》第二卷，第202页。

⁸ 章百家：《改变自己，影响世界——20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刍议》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第16页。

胡锦涛指出,“始终站在国际大局与国内大局相互联系的高度审视中国和世界的发展问题,思考和制定中国的发展战略,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¹ 新世纪中国外交的最重要任务是最大可能地为国内发展提供有利的外部环境,即一个长期稳定的国际环境,一个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一个平等互利的国际合作环境,一个客观友善的国际舆论环境。从时间的角度看,当代中国外交在致力于把握好 21 世纪头 20 年这个战略机遇期的同时,也要尽可能为争取战略机遇期的延长夯实各种条件;从空间的角度看,当代中国外交要致力于推进整体的战略布局,即“周边是首要,大国是关键,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舞台”,大力推进全方位外交。

(三)坚持判断国际形势的辩证思维

国际局势具有综合性。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坚持挑战与机遇并存,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消长,总体趋势与局部问题并存,是正确判断国际形势的基本前提。例如,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以后,中国领导人对亚非拉地区的革命形势做出过于乐观的估计。² 尽管西方国家在 20 世纪 60 年代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但令人遗憾的是,此等国际局势变化并未引起中国领导人的足够重视。坚持用联系的眼光观察国际问题,有利于我们妥善应对各种外部因素,用好外部环境中的积极因素,化解不利因素,做到因势利导。

国际局势具有变动性。“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1998 年 8 月 28 日,江泽民在第九次驻外使节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都在发展,还会出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³ 影响国际局势变化的因素是多样的,如国际力量的对比、霸权主义的发展、全球问题的凸显等。同样,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也是变动的,这对中国外交创新工作机制提出了现实要求。例如,近年来,中国公民和企业“走出去”的数量显著增长,仅 2006 年,中国公民出境人数就达 3 452 万人次,是改革开放前 30 年总和的 120 多倍。考虑到海外安全局势日趋复杂,中国外交进一步加强领事保护预防和应急机制建设,积极践行“以人为本、外交为民”的理念。坚持用发展的眼光观察国际局势,善于从国际条件的变化中把握发展方向,有利于我们以开阔的胸襟和远大的眼光推动中国外交“更上一层楼”。

国际局势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准确把握大国关系变化及其趋势是科学判断国际局势的重要尺度和关键因素之一。只要大国关系不出现重大变化,国际局势总体上就会保持稳定。世界历史发展的经验表明,一次或者几次偶发事件不会迅速从根本上改变国际关系的总体趋势。凡是成熟的大国,其外交政策在一定历史时期必然具有一定的连续性。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政府和人民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⁴ “风物长宜放眼量。”只有着力把握国际形势发展的总体特征,而不局限于一时一事的得失,才能有利于我们掌握正确认识外部环境的主动性。

概言之,科学判断国际形势,应学会长时段的动态考察。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那样,“对国际形势还要继续观察,有些问题不是一下子看得清楚,总之不能看成一片漆黑,不能认为形势恶化到多么严重的地步,不能把我们说成是处在多么不利的地位。实际上情况并不尽然。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⁵ 这段充满睿智思想的论述对于正确应对国际局势的“变与不变”,增强判断国际形势的战略性、前瞻性、指导性,进一步提高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收稿日期: 2009 - 06 - 03]

[修回日期: 2009 - 07 - 07]

[责任编辑: 主父笑飞]

¹ 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3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第 27 页。

² 1957 年 11 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上指出,“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参见毛泽东:《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载外交部编:《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291 页。

³ 《江泽民文选》第二卷,第 201 页。

⁴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载《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 45~46 页。

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54 页。

ing china's innovations in the diplomatic institutions and offer indispensable institutional context and organizational basis for grasping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New China's Diplomacy: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Changes

Qin Zhikai (57)

The examination of New China's diplomacy can never be separated from the strategic thinking of Chinese leaders on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Mao Zedong had adjusted China's foreign policy to the evolution of bipolar system, and ultimately made it return to the normal track. Since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1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the several generations of central collective leadership has exhibited broad "world view" and profound "strategic thinking" based on a pro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hanges to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s well as the close ti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outside world, and elevated China's diplomacy to a new height of all-round development. In the past 60 years, the Chinese leaders' skillful judgment on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provides some useful clues for thinking a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the times, the coordination of both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interests, and the adhering to the dialectical way of thinking.

International Law: The Source of Legitimacy, Enforceability, and Interplay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Li Zhiyun (65)

The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law are closely connected and complementary to each other, and, between them, the international regimes theory is the bridge for interdisciplinary cooperation. Actually, the international regimes and international law are only different analysis from different angles to the similar or overlapped issues, with great potential and prospects for cooperation. The demonstration of the source of legitimacy, enforceability and interplay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by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 IR, illuminate the further study on the issues of international law.

Analysis on the Campaign for a Nuclear Weapons Free World

Kong Guang Yao Yunzhu (73)

As the role of nuclear weapons is devalued in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es, the threat of nuclear terrorism looms large, international nonproliferation system confronts with severe challenges, the peaceful use of nuclear power increases the possibility of 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technology and materials, and the new US government pursues "cooperative security" rather than "absolute security", "a world free of nuclear weapons" initiative, put forward by the four senior American politicians in January 2007, received enthusiastic responses worldwide and introduced a new wave of abolishing nuclear weapons campaign. The initiative includes suggestions of three aspects: reaching world consensus, taking step-by-step and effective measures, and designing the modes towards a world free of nuclear weapons. This campaign enjoys a right timing, strong rallying point, wide international mobilization, great impact on the political leaders, and more support from the governments. However, with great obstacles, there's a slim hope to truly realize a world free of nuclear weapons, but a new round of nuclear disarmament negotiations can be expected.